

俄羅斯的中國哲學研究

——十七世紀末～二十世紀末(上)

布羅夫(Владилен Г. Буров)

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249-253

俄羅斯學者對中國哲學的研究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期，第二時期是從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第三時期是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第四時期是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

第一時期：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期

第一時期可以叫做介紹時期，有關中國第一本俄文的書是斯巴發利(Спафарий, 1636—1708)所寫的，他在1675年奉派訪問中國，身負外交使命，於1678年寫了名叫《包括中國國家亞洲的全世界的第一部分》的手扎，¹其中不僅有當時歐洲圖書中引用的有關中國知識，而且還有作者自己的考察，特別是關於從俄羅斯到中國沿路，和俄羅斯的中國邊境區。這本書也有關於中國宗教與哲學；孔子學說等的知識。它雖然沒有出版，但是副本(抄本)流傳頗廣，包括國內與國外。1693年在巴黎，耶穌會士d'Avril發表了《到歐洲與亞洲各國的旅行》一書，在書中他幾乎逐字地引用從斯巴發利取得的資料。

在十八世紀末俄羅斯圖書館已有了中文圖書，有些西伯利亞城市且創設了教中文的中學。那時已出版了幾本有關中國人民精神文化、宗教與思想的著作，它們之中有些是歐洲傳教士所寫書籍的俄文譯本，如《中國最重要的哲

學家古代學說的恢復者孔子或者是孔夫子像歐洲人叫做他的生活》一本書。²它是在《論語》、《書經》、《詩經》基礎上所寫的。這本書於1790年在聖彼得堡出版。早些在1777年，聖彼得堡也出了《中國哲人或者是在社會中怎麼住平安的學問》一書。³它是從法文、德文與英文資料翻譯而成的。這是本解釋儒學經典書籍論點的書，但是這些解釋有其特殊性，因為歐洲傳教士把儒學與耶穌教連接起來，所以有時儒學經典著作的句子像是福音書的性質，不像是孔子或者是孟子的論點。這樣的態度也在下列書中表現出來：《天使談話》(聖彼得堡，1781年)，⁴《中國思想》(聖彼得堡，1772年)⁵與《德佩——中國人》(聖彼得堡，1771年)。⁶

俄羅斯宗教使團在為俄羅斯人介紹中國文化，包括中國哲學事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個宗教使團在1715年到達北京，宗教使團成員有三項任務，分別是：為住在北京的俄羅斯居民(卡薩克)服務，翻譯滿清朝廷給俄羅斯政府的正式公文，學習中文、滿文與蒙文。這些宗教使團成員後來成為中國經典著作的主要翻譯者，比方說列奧尼切也夫(Леонтьев, 1716—1786)翻譯《中庸》與《大學》。1784年《中庸》在聖彼得堡出版，書名為《中庸就是確定不移的法律》，⁷1780年他寫完了手稿《大學或者是偉大的學說》。⁸

1. 它第一次出版是在1910年Спафарий. 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ая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ыя, именуемой Аз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прочими его города и провинции. Казань, 1910, LVI, 271 с.
2. Житие Кунг-Тсеца или Конфуциуса, как именуют его европейцы, наисланейшего философ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востановителя древняя ученост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790, 606 с.
3. Кнтайский мудрец или наука жить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 в обществе, состоящая в наипольнейших нравоучительных наставлениях. сочиненные ДРЕВНИМ ВОСТОЧНЫМ браминно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773, ХХII, 85 с. второе тиснение, 1777, ХV I, 74с. третье тиснение, 1785, ХV III, 93с.
4. Бранкати Франческо. Тянь-Шинь Ко то есть Ангельская беседа. Санкт- Петербург, пер. А. Леонтьева, 1781, 117с.
5. Китайские мысл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ер. А.Леонтьева, 1772, 2-е тиснение 1786, 331 с.
6. Дпей-китаец.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ер. А. Леонтьева, 1771, 50с.
7. Джун юн. то есть закон непреложный. Из преданий китайского философа Кун Дз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784, 132 с.
8. Да Хие то есть учение Великое, 1780 (рукопись).

列奧尼切也夫對這兩本書作了注釋，指明他是很深刻了解中國哲學，特別是五行與陰陽學說。另一個宗教使團成員羅索金（Рассохин）翻譯《四書》，他未發表的手稿叫做《四書，關於中國孔夫子法哲學各種推論》，⁹目前仍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圖書館保存著。

那時有些進步的俄羅斯思想家利用中國哲學資料，其目的是想發展自由思想，例如：諾威克夫（Новикова）在他1770年出版的《諷刺雜誌》中，發表了兩篇從中文翻譯的文章，¹⁰它們是列奧尼切也夫所作的，這些翻譯有很多地方可以跟當時俄羅斯現實環境相比較，在第一篇翻譯為〈陳子中國哲學家對他的國王勸告〉的文章寫道：

「你應該知道，從來沒有不願意對自己的臣民帶來幸福的國王，但是只有一些人達到這個目的，原因在於國王經常是輕信的，他們周圍有諂媚者，所以不能知道自己臣民的真正情況，無法做有益的事，也無法獎賞合乎道德的人，這就是因為從別人的觀點來看」。¹¹

那時葉卡切立娜皇后開始拒絕改革政策，所以引出中國哲學家的話，是要警告她不要這樣做。

俄羅斯首幾位漢學家因為沒有先驅者指引，所以他們對中國經典著作的翻譯有嚴重的錯誤，而且在注釋中，他們企圖發現儒學與耶穌教相近的地方。當時俄羅斯學者之中有兩個派別：一種是讚美中國道德規範，另一種沒有把中國社會政治與精神機構視為是其他國家的榜樣。羅索金在《關於伏爾泰有關中國筆記》¹²的手稿中批評法國哲學家，認為他們把中國與其皇帝理想化，不真確的把儒學稱做——文化管理國家的非常美麗的宗教。

第二時期：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第二時期從彼丘林（Бичурин, 1777—1853）開始。彼丘林是他的世俗名，宗教名叫做神夫伊阿金夫，他在中國待了二十多年，非常喜歡中國與中國文化。他在聖彼得堡著名墳地的墓穴，所豎立的墓碑上有中文寫的題詞——彼丘林可以稱為「俄羅斯漢學奠基人」。首先該指出他對歐洲傳教士的學術活動，有其自己的看法，他這樣寫道：

「他們關於中國寫了很多東西，正確的與詳細的，但是很注意傳教事業，所以儘管有從各方面研究中國，卻很少時間去觀察這個國家的整體。他們描寫中國的個別性，並且有時不是明確的與完全的。此外描寫的時候，他們指導性的規則與動機並不是一致，有些想把耶穌教比多神教變的高尚，所以故意只就壞的方面去說中國；有的想在中國故事跟聖經上的古代事件發現相同之處。但是事實上它們與亞洲東方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之中竟有把中國人看成聖經舊的人民之一，並且把孔子思想家叫做預告救世主到來的神意闡釋者。」¹³

彼丘林寫了很多著作，大部分到現在還沒有發表，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叫做《中國帝國統計記述》（聖彼得堡1842年），¹⁴書中詳細的說明中國社會各方面，有歷史、經濟、人口、文化、宗教、哲學等。

在書中他解釋孔子、孟子之道德、政治學說，就是每一個人應該按照一定的社會規範與其社會地位來做事。彼丘林把儒學叫做「作為國家管理基礎的學人宗教」，尊敬父母、尊敬國王與其官吏，就是這個宗教的基本原則，它們是透過教育方式培養出來的，彼丘林指出：

「學人宗教與其哲學有密切的關係，這表現在每個人是本性善良的，他的精神本性裏面有自然法則，這就是中庸、正直、博愛、公正，他應該根據這個法則行動。但是由於教育、體格特點與意志等的影響，使人走近惡路，他的本性光就暗淡起來。但是有時與生俱來同別人不一樣的精神與身體的品質的人，這些人不能逃避自然法則，他們以其內心經常依中庸作行動，依正直作命令，依博愛作打算，依公正作事，這就是聖人，他們與天組成統一的本性，他們就是天，正是自然法則。」¹⁵

彼丘林認為孔子與老子對於人的行為道德規範有同樣的觀念，但是他們兩個對道德教育卻有不同的看法。

彼丘林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國，其居民風俗、習慣、教育》（聖彼得堡，1840年）¹⁶一書中，不只是討論儒學與儒教的關係，而且說明周敦頤《太極圖說》的內容與朱熹等宋代哲學家對這個著作的注釋。

9. Книга Сышу или Шань-лунь-пю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Кунфудзыского закону 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е разные рассуждения (рукопись).
10. "Трутен" 1770, февраль. "Пустомеля" 1770, июль: Сатирические журналы Н.И.Новикова.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1, с.209-212, 350-360.
11. Чэнзы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философа совет, данные его государю. Сатирические фурналы Н.И.Новикова.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1, с. 209-210.
12. И.Рассохин. Примеча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заметок Вольтера о Китае (рукопись).
13.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42. ч.1, VIII-IX с.
14.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42. ч.1, XXXII, 279 с., ч.П. 350 с.
15.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42. ч.1, с. 66-67.
16.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Китай, его жители, нравы, обыча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40, VIII, 442 с.

彼丘林過世以後，1906年，北京發表了他的著作《學人宗教記述》，¹⁷內容是關於儒教儀式。

1865年一位思想家沙列古諾夫（Шелгунов）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的文明〉¹⁸，他本不是漢學家，但他發表的文章有其一定的意義，因為他代表俄羅斯進步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的理解，他認為將「孔子原則」訂為典範，把儒學變成國家宗教，對於中國社會發展是有很大的害處。他這樣寫道：「殺害中國」，「孔子道德原則如針對個人自身就好，但是應用於社會與國家生活，它們會帶來損害。」¹⁹

在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俄羅斯漢學家出版有關中國哲學專著的有：瓦希列耶夫（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的《中國文學史概要》（聖彼得堡，1873年）²⁰與《東方宗教：儒教、佛教與道教》（聖彼得堡，1877年），²¹戈奧爾夫斯基（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的《中國歷史第一時期》（聖彼得堡，1885年出版）、²²《中國生活的原則》（聖彼得堡，1888年）、²³《研究中國的重要性》（聖彼得堡，1890年）、²⁴《中國人神話的觀點與神話》（聖彼得堡，1892年）。²⁵

瓦希列耶夫與戈奧爾夫斯基之著作有重大的學術價值，第一，它們有很豐富的史料學基礎，很多經典著作的摘錄；第二，兩位學者特別注意道學與儒學在中國人民精神生活的地位；第三，中國哲學首次不被看作是一套道德教訓，而是做為關於宇宙、人的地位、行為原則等的體系。

瓦希列耶夫解釋宋代儒學包括張載、二程、邵雍、朱熹。他特別注意佛教原則，這是當時對佛教最認真的分析。同時，有些人不能同意他所提下列的論點：「中國人完全不是哲學家，因為他們到現在也還不理解，形而上學與邏輯學有關的嚴格整體系。」²⁶

戈奧爾夫斯基堅持另一個立場，他強烈批評西方歐洲學者對中國的傲慢態度。有關歐洲主義的趨向，他的論點

很有意思：

「幾乎所有這些人認為中國是因循守舊，但是，這不是他們自己所作結論的結果，而是有三個原因，第一他們完全不知道『天帝國』，第二是他們思想的狹隘性與墨守成規，第三是對有些漢學家言論的盲目信任。」

有些漢學家說中國是一個歷史化石，就是合乎歐洲人的愛好，因為這樣使他們，特別是歐洲哲學家自尊心得到滿足。歐洲哲學家有可能是將歷史資料放在先驗的公式之內。比如說：著名的黑格爾怎麼評價人類歷史？他把人類歷史看作是全世界精神自覺其本質，也就是有自由發展的意思。按黑格爾論點為了達到自覺的完全世界精神，必須走三個階段—正題、反題、合題，黑格爾按這三個階段排列世界歷史，也是把它劃分三個部分（東方世界、希臘—羅馬世界，耶穌教—德國世界），他宣布在東方精神沒有自覺自己的自由，在古典世界只有些自覺自由的形式，而只有德國人得到自覺自由的完全。在中國自覺精神睡覺，在印度它幻想，在波斯開始睡醒。除了世界歷史三分法以外，黑格爾也許可以四分法，就是東方是人類的萌芽期，希臘是它的少年時代，羅馬是它的成年時代，而德國是它的老年時代。在兩種分法條件之下，中國還是在全世界精神自覺最底的階段。

實證主義者康德怎麼樣看人類歷史？他認為人類歷史是世界觀三個時期法的表現（神學時期，形而上學時期與實證時期），同時他把它劃分成三個階段—偶像化、多神教與一神教。偶像化是在前歷史時代存在，至於東方人民為多神教，所以按康德體系『天帝國』也是屬於在發展很低的階段上。但是為什麼黑格爾、康德等人沒有想中國文明比他們所想的高多了，中國歷史比他們所想的進步多了？這是因為他們盲目的信任有些漢學家，這些漢學家直接的或是間接的給大家看到中國是一個停滯的王國。」²⁷

戈奧爾夫斯基在關於中國哲學上作出了許多正確的論點。例如說他寫道：「孔子也不是宗教體系的創造者，也

17.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Описание религии ученых (Одно из религиозных учений Китая "Жу-цзяо"). Сост. в 1844. Пекин, 1906. 77с.

18. Шелгунов Н.В. Сочин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3-е изд., 1871, т. 1, с. 111-168.

19. Шелгунов Н.В. Сочинени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3-е изд., 1871, т. 1, с. 113.

20. Васильев В.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0, 163 с.

21. Васильев В.П. Религия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3, 2, 183 с.

22.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до императора Цинь-ши-хуань-д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5, 321 с.

23.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8, XXII, 494 с. XVI, с.

24.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0, 4, 286 с.

25.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2, XIV, 118 с. XV, с.

26. Васильев В.П. Религия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3, 161 с.

27.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0, с.6-7.

不是它的改革者，孔子不愛討論先驗的真理」。²⁸戈奧爾夫斯基認為：儒學不是宗教，而是實證哲學。按他觀點「中國只是在比較晚期知道了一神教，它本身永遠沒有關於天主——創造者及關於原生精神的理解」，²⁹「上帝不是世界的創造者，而是人們的父親，他觀看他們，照顧他們的幸福，對有些人獎賞，對有罪人懲治」，³⁰「中國人認為自然界不是創造而是自立出生的」。³¹戈奧爾夫斯基公正的寫道「中國人的天祭祀就是祭祀祖先」，³²所以不可能同意傳教士的意見和觀點，傳教士認為中國人古代信念跟聖經的信念是相通的。

戈奧爾夫斯基也分析老子學說。按他的觀點：「老子的體系是中國人哲學思維的本質。他的『道』是原始物質，也是原存在的觀念，『道』是『局部存在的』，包括人神吸引。」³³他對孔子評價是很高的，「他（孔子）是有才能的思想家，是偉大的道德說教者，所以他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是一位智慧的理想者。」³⁴

同時戈奧爾夫斯基很強烈的批評楊朱與墨子的學說，他說：

「墨子宣傳優劣的利己主義，這一類的利己主義是所有『莫明人』活動的內幕（或根據），但是楊朱宣傳人死亡以後，其神也消滅，所以他把墨子優質的利己主義歸咎於低的利己主義、庸俗伊比鳩魯主義的利己主義……，楊朱所宣傳的庸俗伊比鳩魯主義不可能作為人民群眾行為的健康生命基礎，同時墨子所提出來的利己主義（跟功利主義接近的）按其定義是過分模糊的，所以它也不可能作為每一個人活動的一種指南。」³⁵

戈奧爾夫斯基對於中國社會、政治與文化發展進步的評價很高，他認為中國不是一個「種姓」的國家，不管什麼階層出身，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達到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中國社會有政治與法制平等；中國社會與精神方面的成就與儒家哲學有關係，他把它叫做中國進步的發動機。儒學的道德、政治等原則，鼓舞中國人實行腦力活動，使他們高尚起來，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差別。在這一方

面，戈奧爾夫斯基事實上是在重複自己的導師瓦希烈耶夫的論點。瓦希烈耶夫寫道：「任何地方沒有像中國這樣的全民識字，任何民主國家沒有像中國那樣提高真理的嗓音，任何地方下層的人民沒有像中國那樣參與上層的談話與事情。」³⁶

當然，瓦希烈耶夫與戈奧爾夫斯基的論點是有點誇張，這是一種獨特的以中國為主的觀點，但是應該可理解俄羅斯當時的思想情況，因為為那時俄羅斯知識分子正在討論祖國的未來，該走什麼路？很多人想走歐洲路線，他們完全拒絕亞洲國家經驗，包括中國。

「歐洲中心論傾向」在索羅沃也夫（Соловьев, 1853—1900）《中國與歐洲》一書中最明顯的表現出來。³⁷索羅沃也夫是一位偉大的宗教哲學家，他是一種獨特哲學體系的創造者（所以在蘇聯政權的時候，索羅沃也夫的著作是沒有再版的），但是他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國歷史、文化與哲學。比方說索羅沃也夫寫道：「中國人的理想全部屬於過去的，他向後看而不是向前看，如果他像孔子一樣想改革，那就是想清除危害的新東西，以完全回到古代。」³⁸按索羅沃也夫觀點，中國人是不可能創造精神與學術價值的東西。他寫道：

「不管中國文化如何結實與物質方面的完全，它在精神方面沒有什麼成果，而且對全部人類沒有什麼益處，它對中國本身是好的，但是在任何領域，對全世界而言，並沒有發明一個偉大的思想，沒有創造一個有價值的東西。中國人民是數量多的人民，但不是偉大的，而且也沒有偉大的人物，唯一的例外是老子。」³⁹

索羅沃也夫也不懂老子的學說。他這樣寫道：

「很多思想家、神祕主義者，對於理性與科學採取敵視的態度，但是老子作為真正的中國人，在他的書中，這種原則性的蒙昧主義有其特殊性與特別的意義……，他否定理性與科學，向全部人民介紹簡單的無知，做為一個真正的社會理想。」⁴⁰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出版了幾本有關中國文化

28.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0, с.35.

29.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5, с. 284.

30.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н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5, с.285-286.

31.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2, с. 1.

32.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5, с. 290.

33.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н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5, с. 298, 299, 301.

34.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ринципы жизни Кит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8, с. 352.

35.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М.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кита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85, с. 310-312.

36. Васильев В.П.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3, с. 74.

37. Соловьев В.С. Китай и Европ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VI,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04, с.

38. Соловьев В.П.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VI,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04, с. 107.

39. Соловьев В.П.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VI,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04, с. 126.

40. Соловьев В.П.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VI,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04, с. 110.

與中國哲學的通俗著作。一般來說，這些作者並不是漢學家，所以這些著作沒有什麼學術水準，例如：口爾金（Корягин）1891年在聖彼得堡出版一本關於孔子的書（第二版在1897年出版），⁴¹他對孔子總的評價是這樣：「孔子本身完全體現中國人民性格，他是純種的中國人，『中國人中的中國人』，是人民精神中世界觀的表達者。」按他的觀點，中國人：

「起初也曾是現實主義者，其思想與感覺全部為直性的、可見的與可觸摸到的聯繫起來。他對所有觀念中超過現實期限的完全不關心。中國人想像（力）不如別的人民那麼發達。孔子學說與孔子本身具有枯燥與純理主義的性質，同時是沒有任何唯心主義的。」⁴²

當時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辦了翻譯與出版有關孔子、老子與墨子的通俗小冊子。這就是《孔子·其生平與學說》（莫斯科，1909年，第一版；1910年，第二版）、⁴³《中國哲人老子的格言》（莫斯科1910年，第一版；1911年，第二版）、⁴⁴《老子·道德經或者是關於道德的書》（莫斯科，1913年出版）、⁴⁵《墨子·中國哲學家關於兼愛（普遍愛情）的學說》（莫斯科，1910年，第一版；1911年，第二版）。⁴⁶托爾斯泰本身校訂每一本小冊子。他的想法是要在中國哲學中，「找到」與耶穌教相通的地方。按托爾斯泰的話，「孔子認為一切的人都是一樣的，他們都有上天（宗教）的原理，所以都是平等的，都是兄弟，所以永遠不是孤獨的。」⁴⁷至於老子學說，「其本質也跟耶穌教的本質是一樣的」，⁴⁸「實行墨子學說，全世界就可以成立天王王國。……」⁴⁹

第二時期中的一項特點，在俄羅斯學者只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他們好像認為孔子、老子、孟子以後，中國哲學就完了。比方說瓦希列耶夫對宋代儒學作這樣的評價：「其（宋代儒學）就是古代經典的儒學，它只是加以系統化，並有了從那些經典拿來的形而上學的論據。」⁵⁰1851年索迷爾（Зоммер）發表了那時唯一的關於中國中世紀哲學的一篇文章〈關於新中國哲學的原理〉（喀山大學學報）。⁵¹索迷爾分析宋代哲學以後，做這樣的結論：「也許這也不是哲學，因為它不是思辨哲學。」⁵²

在第二時期出版了一些經典著作的俄文譯本，如：墨諾斯提列夫（Монастырев）所作的《春秋》譯本（聖彼得堡，1876年）；⁵³波波夫（Попов，1842—1913）所作的《論語》譯本（聖彼得堡，1910年）、⁵⁴《孟子》譯本（聖彼得堡，1904年）⁵⁵；伊瓦諾夫（Иванов，1878—1937）所作的《韓非子》譯本（聖彼得堡，1912年）。⁵⁶

1917年10月，蘇聯共產黨取得俄羅斯政權，起初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沒有影響到漢學。俄羅斯的漢學研究工作像過去一樣繼續進行，他們受到的困難，主要是跟物質條件有關。1923年，阿列克謝也夫（Алексеев，1881—1951）發表了一篇〈從中國角度來看孔子學說〉⁵⁷的文章。（阿列克謝也夫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學者，得到了院士稱號。）在這篇文章裏，他分析胡適的《中國哲學大綱》，同時也說明他本人怎樣去理解孔子的道德政治學說。按他觀點，「仁」的概念是「人」全部活動最主要的法典，這就是要求處處且永遠跟隨「真的人」的原因。

（下期續完）

41. Корягин К.М. Конфуций. Его жизнь и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ое изд. 1891. 77 с. 2-ое изд. 1897.

42. Корягин К.М. Конфуций. Его жизнь и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91. с. 69.

43. Буланже П.А. Конфуций. Жизнь его и учение. 1-ое изд. под ред. Л.Н.Толстого. Москва. 1904. 2-ое изд. 1910. 48с.

44. Изре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Лао-Тзе. избранные Л. Н.Толстым. Москва. 1910. 32 с. 2-ое изд. 1911.

45. Тао-те-кинг или Писание о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д ред. Л.Н.Толстого. Пер. с кит. Д.П.Конисси. Москва. 1913. 32 с. 這是第二版，第一版約在二十年以前發表。翻譯者客尼是日本人。Тао Те кинг. Лао си. Пер. с кит. Д.П.Конисси. Москва. 1894. 48 с.

46. Буланже П.А. Ми-Ти. кита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Учение о всеобщей любви. Под ред. Л.Н.Толстого. Москва. 1-ое изд. 1910. 16 с., 2-ое изд. Москва. 1911. 32 с.

47. Буланже П.А. Жизнь и учение Конфуция. Москва. 1904. с. 7.

48. Изре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Лао-тзе. избранные Л.Н. Толстым. Москва. 1910. с. 6.

49. Буланже П.А. Ми-Ти. кита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Учение о всеобщей любви. Под. Л.Н. Толстого. Москва. 1910. с. 5.

50. Васильев В.П. Религия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 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3. с. 165.

51. Зоммер Николай. Об основаниях новой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за 1851 г.", т. I, с. 109-167.

52.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за 1851 г.. т. I, с. 167.

53. Монастырев Н. (пер.) Конфуциева летопись "Чунь-Цю",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6. 108 с. его же Заметки о Конфуциевой летописи "Чунь-Цю",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6. 52 с., его же Примечания к "Чунь-Цю",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876. 256 с.

54. Попов П.С. (пер.) Изречения Конфуция. учеников его и других лиц.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1. 4. X. 126. IV с.

55. Попов П.С. (пер.) Кита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Мэн-цз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04. 262 с.

56. Иванов А. (пер.)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школа Хань Фэя, Хань Фэй-цз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2. 354 с.

57. Алексеев В.М. "Учение Конфуц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синтезе", см. Журнал "Восток", 1923. кн. 3. с. 126-149.